

雨花台革命烈士丛书

雨花台 革命烈士 斗争纪实



雨花台革命烈士丛书

雨花台革命烈士
斗争纪实



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编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雨花台革命烈士斗争纪实

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编

出版发行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通县印刷总厂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.375 插页2 字数170,000

1983年4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3次印刷

印数37,201—75,330册

ISBN 7—5346—0169—X

I·47 定价：2.40元

责任编辑 徐 明

凡遇有印装问题，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前 言

在中国革命艰难的战斗岁月里，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为推翻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，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，进行了轰轰烈烈不屈不挠的斗争。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，面对敌人屠刀坚贞不屈、英勇就义。在雨花台，有近十万先烈壮烈牺牲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诗篇。

为了缅怀先烈，教育后代，建国以来，党和政府把雨花台开辟为烈士陵园，在雨花台的山岗上进行大规模的绿化造林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烈士史料。烈士当年战友、同狱难友及亲属陆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。《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》一书，就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整理编写的。这本书共收入有关恽代英、邓中夏、罗登贤、侯绍裘、卢志英等15位烈士的35篇回忆文章。本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曾先后两次重印。

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他们的遗愿，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，激发青少年立志为振兴中华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、高度民主、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英勇奋斗。

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近年来，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，雨花台烈士纪念碑、纪念馆即将竣工。为迎

接纪念馆开放和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，《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》现改名为《雨花台革命烈士斗争纪实》再版。今后我们还将有计划的整理烈士史料，编辑出版。

我们的工作得到许多老同志及烈士家属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
编 者

1987年11月

目 次

忆侯绍裘烈士	侯佩琛(1)
追忆绍裘同志	毛啸岑(3)
和绍裘同志相处的最后几天	高尔柏(6)
纪念先师侯绍裘	范志超(9)
“作一个有用的人”	曾鼎乾(12)
——回忆母亲的教育	
姐姐的少年时代	郭凤林 郭凤书(25)
——回忆郭凤韶烈士	
回忆郭凤韶	徐明清(31)
回忆恽代英烈士生平	恽子强(35)
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	沈葆英(41)
恽代英在宣城的活动片断	吴蔚春(50)
恽代英印象记	倪崇高(54)
关于恽代英烈士的一些情况	匡亚明(56)
“永鰥痴郎”的爱情	张 羽(58)
代英同志的教导毕生难忘	同 生(67)
谭寿林的青少年时代	谭寿钦(73)
忆谭寿林同志	钱 瑛(75)
回忆邓中夏同志	秦德君(79)
对邓中夏同志的回忆片断	马乃松(85)

- 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陈农菲(88)
- 最后一次见面夏明(100)
- 忆中夏
- 东北抗日联军和罗登贤同志冯仲云(106)
- 登贤同志的两次被捕周冷波(109)
- 忆念罗登贤同志薛雯(111)
- 光照千秋黄静汶 杨放之(114)
- 记黄励烈士
- 回忆我的二妹徐全直徐全德(130)
- 女党员之杰出者帅孟奇(138)
- 记何宝珍烈士
- 人的价值葛和林(146)
- 忆顾衡烈士
- 不屈的女战士郭网琳陈农菲(158)
- 高波同志在烽火剧团李强(178)
- 高波同志在狱中曹又参(190)
- 我的父亲刘亚生烈士的青少年时代刘忠(192)
- 刘亚生郭鹏(197)
- 回忆卢志英烈士二三事张育民(222)
- 视死如归不动摇孙稚如(225)
- 忆卢志英烈士在狱中
- 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卢大睿(229)

忆侯绍裘烈士

侯佩琛



我的弟弟绍裘小名鳌，一八九六年四月出生。弟弟下巴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，雪白的小脸上多了一样东西反而显得更加可爱，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，尤其是祖母。

周岁以后，弟弟已经会说话了。祖母有时生了气，只要把鳌弟抱给她，就烟消云散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

鳌弟四岁上学，很聪明。启蒙老师沈仙根先生，是父亲的朋友，常常对父亲说：“这孩子性情和易，说话真诚。年纪虽小，一举一动和其他孩子不同，你要好好地培养他。”

那时父亲因不善经营，经商失败。常常苦思焦虑，已有一身疾病，还不时要到店中筹划一切。难得有暇在家休息，他才讲些故事给我们听。鳌弟最喜欢听《水浒传》，当听到英雄末路，被逼得有家难归，他总是眨着小眼睛，愤愤不平地挥着拳

头，嚷嚷着要报仇。有一年，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好几个月还未痊愈，一家人都很焦急，他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母亲病得真苦，幸亏我听话，不然妈妈还要苦呢。”父亲让他说得笑了起来。

弟弟十岁那年，父亲去世了，商店随之也倒闭了，家中经济状况很不好。由于请不起先生，弟弟只得每天步行很远，到堂兄家去读书，直到十三岁那年，他才进了当地华娄高等小学读书。弟弟十七岁时考进了省立第三中学。

在中学时代，弟弟的思想起了变化，开始注意社会上所发生的事。每逢神赛会等事，他最为反对，常说：“迷信不铲除，科学就不能进步。”他和同学李均才、朱允文等都是不满二十岁的有志青年，课余之暇，常常纵谈国事，并印刷小型的宣传品。

整弟见地方上种种黑暗，就与友人沈联璧、钱江春等创办《松江国民日报》，揭露时弊、主持正义，宣传革命道理，因此，地方豪绅颇为仇视，不久便被迫停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一次，弟弟在《松江国民日报》上登了一篇欢迎孙中山先生的文章。不料，第二天就有人在另一种地方报上登了反对他的文章。

后来，弟弟考上“南洋公学”，我在“务本女塾”读书，见面的机会渐渐少了，偶尔碰头，也是略谈数语。直到他民国十六年殉难为止，其间不过匆匆数面，只有儿时的情況，历历如在眼前。

追忆绍裘同志

毛啸岑

一九二〇年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吴江县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时，一个高高身材，瘦瘦脸庞，面颊上有颗黑痣的青年人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后来得知，他是江苏省临时党部派来参加会议的侯绍裘同志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吴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，侯绍裘提出“打倒军阀、打倒帝国主义”，并号召大家要与教会做斗争。当时，我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既然主张信教自由，为什么要反对教会？绍裘同志开导我说：“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，这和信教自由是两回事，不可混为一谈。我们当前的斗争，光喊打倒军阀没有用，必须和军阀的靠山——帝国主义做坚决的斗争。”

一九二七年，为了配合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，侯绍裘派我到南京路和浙江路一带商店联系罢市之事。临行前，他郑重地关照我，必须勇敢，假如碰到意外，要机警些，不要害怕，更不能临阵退缩。当时我问绍裘同志，为什么法商水电公司不罢工？绍裘解释说：“这是交换条件，是另一种方式的斗争。‘法租界’当局现在允许我们半公开活动，我们就来个欲擒故

纵，这样对我们有利。”

绍裘同志教我各种秘密工作的方法。如怎样秘密接头，怎样化装才看不出破绽。特别关照我当有人从背后喊自己姓名时，不要立即回头，防止特务跟踪逮捕。有次侯绍裘同志挟了一包宣传小册子，带我到南京路的商店去散发。他叫我在外面望风，他自己装成买东西的人，走到靠里面的柜台边，抽出一本小册子，放在柜台上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。象这样散发了几户人家以后，就由我来散发，他为我望风。经过这次锻炼后，我的胆子大了，也更老练了。

当时，在生活上尽管十分艰苦，但同志们互相帮助，心情是愉快的。有一次，我知道绍裘身上没有钱了，饿着肚子，我还有一百多个铜板，要分一半给他，他坚决不收。一天中午他到我家时，我正在炒螺蛳，便留他吃午饭，并抱歉地说没有菜。绍裘同志风趣地说：“唔，这可是只好小菜啊。”我的儿子正在呀呀学语，绍裘同志把他抱起来，教他唱：“小小瓶，小小盖，小小瓶里有只好小菜。”

同年四月七日晚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南京金陵酒家设宴欢迎蒋介石。绍裘同志关照我们要多悬挂些横幅标语，写上“欢迎革命的蒋总司令”。我对这种做法有些不解，绍裘同志说：“欢迎革命的，就是不欢迎反革命的蒋介石。”黄竞西同志擅长排笔大字，就包揽书写标语，我和刘重民负责悬挂，不一会儿，就完成了。九日下午一时许，江苏省党部被暴徒捣毁，张曙时同志被绑架失踪。傍晚，侯绍裘约我在四象桥南洋旅馆商讨对策，定于翌日召集十万人的群众大会，示威请愿，向

蒋介石提出三点要求：(一)释放张曙时；(二)惩办捣毁省党部的暴徒；(三)执行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。第二天当我们到达会场时，得到密报，有暴徒准备暗杀侯绍裘同志。担任会场纠察的是兵工厂的工人，他们闻讯后要回厂携枪前来保护。绍裘同志认为不妥，担心到会群众可能发生意外。于是和工人纠察队商量作了适当的自卫工作。九时许，会场情况越来越坏，同志们都劝绍裘离开会场为宜，绍裘同志才越墙而出。临行前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大会由你和刘少犹(当时南京市党部负责人)同志负责，如果斗争失败，我们各回家乡，一切从头做起。”不料从此一别，竟成永诀。

和绍裘同志相处的最后几天

高尔柏

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四月十日，侯绍裘同志就惨遭杀害。四月二日，他刚率领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人员由上海迁来南京。在这七天中，我一直和他在一块儿工作。

这七天是日以继夜的七天，他要领导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筹备组织江苏省政府，经常抽时间 and 同志们研究各部门的工作，给予详细的指示，使同志们了解当前形势，明确工作方向。一天，他和我研究江苏省党部宣传部的工作时，严肃而诚恳地说：“在当前的形势下，宣传工作特别重要，必须抓紧。我们的敌人是不少的，外有帝国主义的造谣中伤，内有反动派和军阀的破坏伎俩，特别是蒋介石已有异心。我们必须根据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，对广大群众进行有效的宣传。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阴谋，使人民有清楚的认识。只有贯彻总理的三大政策，中国革命才能成功，中国才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，中国人民才能过好日子。现在我们除日常的宣传工作外，应该专门筹办一个日报，作为江苏省党部的宣传工具。”绍裘同志详细指示了具体步骤。当时在宣传

部工作的同志，听了绍裘的话都很激动，愿意以百倍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可是，日报尚在筹备中，蒋介石就叛变了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时局是严重的，驻在南京的第二军、第六军都在陆续撤离。因为这两支军队的政治部负责同志都是共产党员，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。蒋介石命令他们离开南京，使我们失去了支持的力量。我和绍裘同志在路上恰好遇到一队队的士兵往城北退去，绍裘担心地说：“形势变得更不妙了。”听了绍裘的话，我心情很沉重。

江苏省党部由上海迁来南京后不几天，局势发生变化，公安局长温健刚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：省党部成员、共产党员张曙时同志被捕；我党与外界联络的电线被切断，我们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。当时绍裘同志敏感地察觉出形势可能要变，但不知陈独秀的态度，也不知党中央将采取什么措施，屡次电报请示中央，不见复文。绍裘同志决定派刘重民同志去武汉当面请示中央。谁知沿江船只被封锁，刘重民同志无法成行。绍裘同志更焦急了，他在房中踱步自语：“如果中央迟疑不决，大好形势就要被反动的乌云所笼罩。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负有重大责任啊。假如中央采取些断然措施，凭我党在第二、第六军中的影响，即使蒋介石玩弄阴谋，南京的形势也不至于变得太糟。”

四月八日，外面风声更紧，谣言很多。绍裘同志仍象平时那样工作，毫不惊慌。当时江苏省党部在安徽公学办公，我和他都住在后院。有人提醒他，为防万一，先租个房间把家属和行李搬出去。他对我说：“我们不怕危险，家属不怕有危险，

行李丢了也无所谓。我们是负责人,更不能随便行动,惊恐不堪。我们不要搬吧。”绍裘同志的坚定态度感动了我,我们决定不搬出安徽公学。第二天,特务闯入省党部,乱打乱抓,我们两家的行李都被砸烂、撕破。事后他说:“损失些行李算什么,生命都随时准备着呢。”

四月十日,他参加一个会议前对我说:“今晚参加会议的系各团体的负责人,研究当前的紧急形势和如何应付的问题,有重要决定。回来后我们仔细研究工作吧。”我关照他:“外面情况不妙,要小心些。”他拍拍我的肩笑着说:“没关系,放心吧。”一挥手就走了。整整一夜我们都等他回来,左等右等不见人影,大家都预感到出事了。天一亮,我和我爱人及一个知道开会地点的同志去寻找绍裘同志。走到会场处,一个老太太对我们说:“昨天这儿抓了许多人,你们快走吧。”我们还想问清楚情况,她却不理睬我们,径自回屋内去了。从此绍裘同志再也没有回来。听说绍裘同志被杀害后,遗体装入麻袋,沉入秦淮河中。

纪念先师侯绍裘

范志超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，侯绍裘和朱季恂开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——松江景贤女子学校。学校的宗旨是：“打倒封建主义，解放妇女。”他们办学的目的是培养新型的妇女，改革落后的社会。他们办学的方针是艰苦奋斗，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。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，侯绍裘同志是引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导师。

记得一九二三年时，侯老师带了我们一班同学去松江城内的府皇庙参观。一跨进庙门，有些胆小的同学就窃窃私语，畏惧得很。侯老师哈哈一阵大笑，随手抓起一个泥佛头，向同学们说：“如果它有灵，应该立即同我搏斗，其它泥佛也该出来助威。可现在它仍在我手里。这就证明这些泥佛不过是堆废物，白白占了那么多公房。若我们将此地改成教室该多好啊！”话音未落，又有几个泥佛被他推倒。旁边有几个同学也行动起来，把泥佛砸了个稀里哗啦。事情传到一帮封建思想顽固的老头儿那里，他们大骂侯老师是“过激党”、“行动有伤风化，亵渎圣灵……”。我们未予理睬，反封建的第一仗打胜了。

又一次，侯老师以“远足”的名义，带我们去城外的秀野

桥。走到一大片荒坟地时，发现有骷髅露在腐朽的棺材外面。侯老师说：“这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实验室的好教具吗？”说罢，他袖子一卷，两手捧起一个骷髅头，走到河边，将它洗得干干净净，给同学们上起课来了。然后，掏出一块手帕把它包起来，问大家：“谁敢捧回学校去？”同学们都抢着说：“我来，我来！”后来，社会上刮起了一阵“过激党又在教女学生做坏事了”的歪风，我们却欣喜这第二次反封建斗争的胜利！

在景贤女子学校中，妇女解放的风气很浓，有个女青年为了逃避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，远道投奔到我们学校来学习。侯老师不但热情欢迎她，还免收她的学、膳费。不久，她母亲知道了，先跟我们师生辩论，理屈辞穷后，又软硬兼施，硬逼那女同学回家。我们同情她，说服她，挽留她。但侯老师发现该同学意志不坚，也就不强留她了。事后，侯老师对同学们教育道：“革命是痛苦的，坚强的革命意志全靠自己磨练，别人是代替不了的！要冲破封建锁链必须有坚强的意志！那个老太婆满口仁义道德，礼仪忠孝，那是杀人的软刀子。”侯老师的言词干脆利落，这些话我印象一直很深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，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，三月，我也到达。四月二日，江苏省党部搬移南京。侯老师就以江苏省党部负责人的名义拍电报给我，邀我去南京，任代理省党部妇女部部长之职。当时，我毫不犹豫，欣然答应。我比侯老师先三天到达南京，相见共叙师生友情，倍觉亲切。从个人经历谈起，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钟还没有结束，我怕他精神不济，影响第二天的工作，就料理他的床铺，再三催他休息。